导　　论

《庄子》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系统研究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庄子》哲学，将把我们带到那个以“战国”这样一个充满着火药味的名称所标示的时代。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风雷激荡、人才辈出、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中后期，诞生了一批充满智慧而又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庄周及其后学。他们以其思维方式的独特、思想的敏锐、辩术的巧妙而崛起于百家争鸣的战场，卓然自成一派，在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一部《庄子》，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形式和内容都远迈前古、长启来人。透过其“缪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下引《庄子》只注篇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学派所垒起的一座智慧的殿堂、思想的丰碑！

作为这样一座智慧的殿堂、思想的丰碑，《庄子》哲学深闳奇特，体系博大，既充满智慧而又多有矛盾，因而尽管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解者甚众，释者不绝，但真能得庄学之真谛者又似不多见。时至今日，对于《庄子》哲学的理解仍多歧见，不同观点的论者各取《庄子》以立论，似论之有据，但究竟是否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庄子》的哲学系统却仍成问题。《庄子》哲学无疑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和复杂的外部联系的系统，要准确地把握它，就必须把它如实地当作这样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系统是整个哲学史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对《庄子》哲学的系统研究必须运用哲学史系统研究法。

一、哲学史系统研究法

任何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应是符合对象本性要求的方法，哲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史系统研究法即是符合哲学史系统本性要求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把哲学史如实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根据其系统本性加以研究的方法。

随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它的哲学反思，人们对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这一事实已有了更清楚、更深入的认识，因而根据事物的系统本性把对象作为系统来研究的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学科领域。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史的精华，其系统性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已被明确指出。黑格尔把哲学史当作“发展中的系统”来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因而被马克思认为是“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①]；其《哲学史讲演录》亦被恩格斯称为“最天才的著作之一”[②]。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指导下把哲学史如实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来研究，这对于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此论之，把哲学史系统研究法运用于作为哲学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庄子》哲学的研究，对于《庄子》哲学研究的科学化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具体谈论哲学史系统研究法之前，有必要简单地谈谈什么是系统和系统方法。对系统科学中使用的“系统”概念和“系统方法”进行哲学概括，似可把“系统”规定为由若干要素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结构成的有机整体，把“系统方法”规定为把对象作为系统，根据其系统本性加以考察、研究的门径或手段。系统的基本特性决定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系统的基本特性主要体现为它的整体性——综合性、相关性——结构性、层次性——有序性、动态性——历时性。系统的这些基本特性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便相应地形成了系统方法的“整体性——综合性”原则，“相关性——结构性”原则，“层次性——有序性”原则，“动态性——历时性”原则。从哲学的角度概括出的系统方法的这些基本原则具有广泛的适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29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203 页。

性。哲学史作为一个纵及漫长时间、横及广阔空间的复杂系统，要对它进行系统研究，运用上述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显然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哲学史系统研究法也就是系统方法的上述基本原则在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它是由系统方法的这些基本原则的运用所形成的一个方法体系或方法系统。

（一）“整体性——综合性”原则的运用

恩格斯曾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① 客观世界的事物都自成系统而又互成系统，从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有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同组成它的要素或部分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但整体的属性、功能、规律只能存在于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作为整体中与其他部分有机联系着的一个环节，具有它作为单个的存在物所没有的新质；系统在整体上具有它的各个部分处于孤立状态下的机械总和所没有的整体性能，这种整体性能是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我们只有从系统的整体出发，在各部分的综合统一中把握各个部分，才能真正把握到部分的规定，认识其属性、功能和地位。系统方法的“整体性——综合性”原则就是系统的这种整体性——综合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根据这一原则，我们研究任何对象都要按其本身所固有的系统整体性——综合性去研究：注意从整体着眼，把整体中的各部分当作整体的必要环节加以综合考察，在综合的控制下进行分析，把分析和综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显然，系统方法的“整体性——综合性”原则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部分和整体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辩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系统方法的“整体性——综合性”原则运用于哲学史研究，便形成哲学史系统研究中的整体考察和分析综合统一法。现试结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92 页。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明如下。

第一，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整体性——综合性”原则，首先要有整体观念，即要把哲学史如实地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人类认识的任何进步都是以前人的认识作为基础的，人类认识的发展因此而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长河，从而作为人类认识史精华的哲学史便形成一个前后相继的概念、命题发展的系统，其中的各个环节互相联系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中国哲学史——从原始五行说哲学萌芽的产生，到先秦诸子哲学的繁荣，再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明清之际的启蒙、清代的朴学等时代思潮中哲学的升华，直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完整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哲学思维发展的曲折历程。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哲学史看作是对理念全体的认识史，特别重视哲学史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他把历史上出现的哲学系统看作是“整体中的诸环节”①，并强调指出，只有“将哲学史认作一个有机的进展的全体，一个理性的联系”，“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②。我们要使哲学史的研究科学化，就必须要有关于哲学史的整体观念，把哲学史如实地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

第二，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整体性——综合性”原则，还要进一步把历史上合乎规律地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潮和哲学理论如实地看作是整个哲学史系统中的一个必然环节，从哲学史发展过程的总体出发去加以考察，揭示它们在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黑格尔说：“每一个哲学在全部过程里是一特殊的发展阶段，有它一定的地位，在这地位上有它的真实意义和价值。”③这是黑格尔从哲学史整体出发所得出的深刻结论。整体中的部分具有它作为单个的存在物所没有的规定，只有从整体着眼加以考察，它才能真正

① ② 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59 年新 1 版，第 38、12、48 页。

被理解。我们只有把历史上合乎规律地出现的每一哲学思潮或哲学理论放在哲学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才能认识它们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如何评价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个“道”作为宇宙本体是超自然的绝对，是抽象观念，从而判定老子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应该批判。但是，老子提出“道”是否就一无是处了呢？当我们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着眼加以考察时，我们就看到：老子第一个提出“道”作为宇宙本原，克服了以前人们用几种具体事物解释万物生成的局限性，成为标志中华民族抽象思维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老子还用他的“道”否定了上帝的威权，用理性代替了神性，这在理性思维的发展史上、在唯物主义或无神论的发展史上都是重要的一环。而且，“道”这一范畴一直被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家所研究和利用，对促进中华民族哲学认识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老子提出“道”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贡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只有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出发，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只是孤立地考察，我们就不会对老子的“道”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当然，就中国哲学史来说，不独对于老子的“道”，对于中国哲学史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周敦颐开理学之先河、二程上承周敦颐下启朱熹、王廷相构成从张载到王夫之的中间环节——如此等等，都应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出发加以考察。在哲学史研究中，把历史上出现的哲学思想或哲学理论放到整个哲学史系统整体中加以考察，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它，揭示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整体性——综合性”原则，还要把每一种哲学思潮或哲学理论自身当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在分析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要从体系上综合考察、总体把握，使分析和综合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把握其思想实质。就中国哲学史来说，观点不同的哲学家往往用同一个范畴、同一个命题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许多范畴和命题都可作不同的解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且，即使同一个哲学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也会对某一范畴、命题作出互有不同、甚或前后矛盾的理解。这样，如果我们不从哲学家思想体系的总体着眼去作综合考察，而只作孤立的分析，那我们就有可能把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弄得面目全非。此外，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也很少纯粹的辩证法家或形而上学者，而往往是这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哲学家的身上。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如果我们不能从哲学家思想理论的总体出发去考察其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成分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把握其系统质，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对其哲学性质作出公正、准确的评判。

总之，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的“整体性——综合性”原则，就是要把整个哲学史、甚至把每一种时代思潮和哲学理论如实地看成一个整体，注意从整体出发去加以考察，从综合出发并在综合的控制下去进行分析，从而把整体与部分、综合与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实质，公正地评价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我们姑且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哲学史整体考察和分析综合统一法。

但是，由于系统的整体性——综合性是由系统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内部结构决定的，同时也与外部环境相关联，因此，对系统方法的“整体性——综合性”原则的运用不能离开对系统方法的“相关性——结构性”原则的运用。

（二）“相关性——结构性”原则的运用

任何事物都处于宇宙万物的普遍联系之中，孤立的单个存在物是不可想象、不可理解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①。系统之所以为系统，就在于它是由各个组成部分相互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0 页。

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的有机整体。系统的结构就是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体系形式或网络形式（包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系统的整体性能主要是由系统的内部结构决定的。不言而喻，没有各组成部分的相关联系及由此造成的内部结构，系统也就不成其为系统了；当然，没有与外界环境的关联，系统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我们要认识或改造一个系统对象，如果离开了对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的研究，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系统的这种紧密联系着的相关联系性质和结构特性就是系统的相关性——结构性。系统方法的“相关性——结构性”原则就是以系统固有的这种相关性——结构性为客观依据，而以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原理为哲学基础的。它要求我们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根据对象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联去研究、处理对象，不能撇开对象的各种复杂联系和内部结构去作孤立的、简单的分析。

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相关性一结构性”原则，就是要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从哲学史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去考察、研究哲学史。

由于哲学发展的批判继承性以及它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能动性和它与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性，哲学史的各个环节不仅既自成系统而又互成系统，而且它们与环境也形成一个系统，从而使整个哲学史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网络结构系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相关性——结构性”原则于哲学史研究时，一定要把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放在各种复杂的联系、结构中加以考察，不能简单化。

第一，我们可以从纵的方向，把整个哲学史看作是一个在时间中先后相继出现的各种哲学观点或哲学理论构成的大系统，考察其纵向联系，把握先后出现的各个哲学环节之间由批判继承关系而形成的结构体系。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

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 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这种继承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一种扬弃，是既批判、否定而又肯定、发扬，或者叫做批判继承。由于这种批判继承，哲学的发展便形成了前后相继的纵向联系。黑格尔说：“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中产生出来。”② 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思想。当然，这里所谓联系并不是消除矛盾对立的抽象联系。因为一种哲学对另一种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就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既批判又继承，既对立又统一——人类的哲学认识就是这样在各种哲学思想的对立统一中向前发展的。这种对立统一集中体现为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和世界的存在方式问题所展开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运动。正是这种对立统一或矛盾运动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形成了哲学史前后相继的本质联系和结构形态。从中国哲学史上自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为了反对精神可脱离形体而独存、且对形体起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从桓谭至王充、杨泉都坚持用‘烛火之喻’(或‘薪火之喻’)来说明形体决定精神、人死神灭的唯物主义观点。但由于这一比喻本身的局限性，结果竟被佛教徒歪曲利用，使得批判神不灭论的武器竟成了论证神不灭论的工具。这是唯心主义在斗争中吸收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资料，把它改造成唯心主义的东西的一个例证，有深刻的理论思维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佛教徒对唯物主义烛火之喻的唯心主义改造，暴露了唯物主义的弱点，迫使唯物主义者不得不寻找新的理论武器来反驳神不灭论，从而对人们认识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结果，南北朝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范缜总结了以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形神问题上的斗争，提出了“舍刃无利”的新譬喻，并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485 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第 9 页。

造吸收了唯心主义者王弼的“体用”范畴，用“形质神用”来说明形神关系，克服了自桓谭以来唯物主义者提出的烛火之喻的局限性，对形神关系作了在当时来说最正确的解释，给了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以致命的打击。由此可见，在形神问题上，正是由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同一，相互诘难而又相互吸收，相互否定而又相互肯定，结果才造成了对形神问题的比较正确的解决，推动了人们认识的发展，从而也就形成了由桓谭到范缜围绕着形神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的历史。哲学史各环节就是这样在对立统一中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结构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史的纵向联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联系，不是同一派别内部的简单的直线继承和传递，而是在矛盾运动中、在否定和吸取对立方面的同时所作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即使同一派别内部也会有矛盾，继承也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扬弃或批判继承，是在发展的同时继承、在继承的同时发展。因此，当我们对哲学史作纵向考察时，必须从矛盾运动、批判继承的角度去考察构成哲学史的各个环节之间对立统一的动态关系，在统一中把握它们的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它们的统一；在它们的相互否定中要留心它们的相互肯定（吸收或继承），在它们的相互肯定中要看到它们的相互否定；从而通过考察它们在矛盾运动中的批判继承关系揭示出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必然规律及其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哲学史矛盾运动（或批判继承）纵向考察法。我们要科学地把握哲学的历史发展，要使我们的哲学史著作不是材料罗列式地、而是有机地反映哲学发展的历史联系，并科学地总结出一些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运用哲学史矛盾运动纵向考察法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的“相关性——结构性”原则，除了上述纵向考察之外，我们还应对哲学史进行横向考察。任何系统都具有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哲学史亦然。除了上面所讲的纵向联系之外，哲学史还具有复杂的横向联系。哲学史在其经历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同时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

之间的复杂联系。而且，正如任何系统都与其环境相关联一样，任何时代的哲学都与自己时代的社会环境密切联系而形成一个开放系统。因此，当我们在宏观上横向考察哲学史时，我们既要考察同一时代并时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考察各种哲学体系与它所由产生的时代的联系。

当我们横向考察哲学史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在哲学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不会只出现一个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而往往在同一时期会有一些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并时出现。这些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哲学家们，有的因为有比较接近的生活环境、个人经历或共同的师承关系等等而可能提出观点大体一致的哲学理论，或者形成一个共同的学派；有的则会因生活环境、个人经历、所受教育以及其他条件的不同而提出互有歧异、甚至互相矛盾的哲学观点，或形成不同的学派；还有的可能因各种原因受到各家各派的影响而力图汇合诸家，提出折衷各派的哲学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派。这些出现在同一时期的或相近或不同、或矛盾对立或折衷调和的哲学思想之间显然会发生各种复杂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形成哲学史的横向结构。如我国南宋道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同一时期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张栻、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等。这些人大多互有往来，在哲学上或互相辩论，或互有评论，他们的哲学观点、他们所成就的哲学体系之间有着各不相同的关系。张栻和朱熹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家，他们之间交谊颇深，学术上切磋论辩，互相促进。而朱熹与陆九渊则有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与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对立，他们之间既有面对面的争论，也有书信的往复辩难。同时，陈亮、叶适作为唯物主义事功学派，又既反对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也反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陈朱之间的争论前后竟长达十多年之久。这样，朱与陆、朱陆与陈叶之间通过争论辩难，各自的观点得以展开、深入和不断完善，对范畴或概念的规定、对命题的阐述、对问题的分析亦更加细密、成熟，从而提高了各自的理论思维水平，促进了哲学

的发展。与此同时，吕祖谦由于深受其“不主一门，不私一说”的家学传统的影响，又兼采各家，力图折衷诸说。他曾举行鹅湖之会，力图汇合调和朱陆；晚年又与倡“事功之学”的陈亮交往甚密，受其唯物主义功利思想的影响，被陈亮引为知音。他把朱、陆、陈、叶之学折衷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样，从逻辑上看，在那同一个时期，张栻、朱熹及其门人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与陆九渊及其门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相对立，且朱陆又统一于唯心主义道学而与陈亮、叶适的唯物主义事功之学相对立，吕祖谦则进一步统一朱陆陈叶而形成一个汇合诸说的折衷体系。这样，由这种对立统一的横向联系便把那同一个时期出现的几种哲学体系纽结在一起，形成为横向结构。正是在这种横向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同一时期各种哲学思潮互相作用、互相促进，不断趋于完善和成熟，从而促进了人们哲学思辨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考察、清理哲学史内部的横向联系及由此形成的横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和揭示哲学如何在各种思想、理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亦有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生动地展示哲学史丰富多彩的内容，避免作简单化、抽象化的线性理解和描述；同时，还有利于我们在阐述各时期的哲学思想时合理地安排其相互间的逻辑结构，以便真实地再现哲学史的本来面目。例如，就上面所谈到的同一时期出现的张栻、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等哲学家来说，在哲学史或理学史著作的叙述中如何安排他们的逻辑次序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理学史著作把陈亮、叶适安排在陆九渊之前，又把吕祖谦安排在朱、陆、陈、叶之前。但如按照本文上述所讲的他们的思想理论之间的横向联系及其逻辑结构来看，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作为统一于唯心主义道学的朱陆之学的对立面，理应放在朱陆之后；而吕祖谦作为折衷朱陆陈叶之学的思想家，则理应放在朱陆陈叶之后。这样安排，似乎能更真实地反映其间的相互联系或逻辑结构，能更好地再现这段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就此即可见注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考察哲学史的横向联系及由此形成的横向结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在这里，我们姑且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横向相关体系结构考察法。

此外，运用系统方法的“相关性——结构性”原则横向考察哲学史时，我们还应考察每个时代或每个时期的哲学与其时代环境的联系，或把每个时代、每个时期的哲学与其时代的社会环境看作是一个系统加以考察。黑格尔认为研究哲学史“必须详细考察一种哲学与它的历史环境有什么样的关系”①。这无疑是正确的。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要有先行资料作为理论前提，而且还要有社会环境作为土壤。任何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产物，它与它的时代密切联系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亦可把历史上的哲学与其所由产生的时代环境的统一看作是一个系统，或称之为横向系统。当我们具体考察这个系统时，我们马上会发现，哲学与它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自然科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时的时代思潮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各个哲学家各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的产生还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紧相关联。因此，当我们从横的方面考察哲学与它的时代的相互联系时，一方面我们要考察一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包括哲学家富有个性特色的生活环境）对哲学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揭示哲学产生、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察哲学对该时代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以便揭示其社会作用的性质，更好地评判其历史地位。

那么，如何考察一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对哲学的影响呢？这主要是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恰当的经济根源考察、阶级根源考察、自然科学基础考察，还要考察其他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时的时代思潮对哲学的影响，也要进行个性环境考察。

关于经济根源的考察。其一，要考察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要求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第 52 页。

对哲学的决定作用。西方哲学在近代之所以侧重于研究认识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要发展生产，需要哲学提供方法论工具。我国汉初之所以大兴黄老之学，主要也是因为它适应了汉初统治阶级发展生产，以便为巩固其新建立的政权统治创造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的需要，也符合了人民要求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愿望。显然，“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①]。其二，还要考察一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天命论的产生，主要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慑于自然压力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推广，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因而才产生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此外，生产力的发展还不断为哲学提出新问题，也不断为哲学提供综合、概括、升华的材料，从而推动哲学的发展。如此等等，我们都要进行认真的分析考察，以揭示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根源。

关于阶级根源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我们指出了理解阶级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指导性的线索”[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考察哲学产生和发展的阶级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区别。我们不能因为过去在这方面有过阶级分析简单化的失误以及被林彪、“四人帮”引入歧途的惨痛教训，就在哲学史研究中放弃对哲学产生、发展的阶级根源的考察。事实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都处于一定的阶级地位，其思想、理论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一定的阶级利益，从而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打上了阶级的印记，而是从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的。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5—486 页。
②《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7 页。

们考察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阶级根源，主要就是看其整个思想体系与当时特定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从而揭示其阶级实质，并特别注意考察这种阶级性对形成其哲学的成就和局限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显示其思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阶级根源。只要我们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指导，就不难揭示哲学与阶级关系的这种联系。周敦颐提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发展模式，看起来似乎与阶级利益无涉，但只要我们从其整个思想体系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把“无极”作为万物产生的最高本体，提出“神妙万物”的命题，正是为了由此得出“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的结论，从本体论上为封建中央集权制作理论论证；他提出阴阳生成万物，也是为了以“生”、“成”比附“仁”、“义”，从而得出“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结论，从宇宙生成论上为封建纲常作理论辩护（以上所引周敦颐语，均见《通书》）。而王阳明之所以提倡“知行合一”说，其政治企图、阶级实质则更为明显，他自己就说得非常清楚：“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明明白白地标榜他的“宗旨”就是根除人们心中任何违背封建统治的“不善”念头，即他所谓“破心中贼”，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止“山中贼”的崛起，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显然，对于这些思想，如果我们不考察其阶级根源，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其阶级实质，不能全面地科学地揭示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

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的考察。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是哲学概括的重要基础，因此，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不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恩格斯曾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态。”[①] 一般来讲，历史上的唯物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4 页。

义总是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就是对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反映。他对“天”的解释即是对当时自然科学中的“盖天说”和“宣夜说”的概括和总结。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中更容纳了许多“质测之学”的成果，他曾经高度赞扬了方以智父子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自觉地以自然科学成果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他曾用天文历法知识批判、嘲笑了古代把日食现象与政治相联系的谬见，并指出只要人们有了正确的历法知识，懂得了天体运行规律，这种见解的荒谬性就连“五尺童子”也能知道（见《读左氏传博议·士文伯论日食》）。至于近代哲学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则是更明显的事。中国哲学中机械论倾向的出现，就是外国自然科学输入的产物。当然，不仅唯物主义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唯心主义也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的。董仲舒的改正朔、邵雍的象数学之类就都歪曲地利用了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至于近代有的哲学家赋予“电”、“以太”等以精神、伦理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属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歪曲利用。我们考察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就是要考察唯物主义者是如何吸收自然科学成果，把它作为唯物主义的基础的；也要考察唯心主义者是如何歪曲利用自然科学成果，把它作为替自己的观点论证或辩护的工具的；还要进一步探讨自然科学对哲学发生影响的规律性。这样，我们就能正确地揭示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

关于其他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对哲学的影响的考察。恩格斯说，经济对哲学的作用，多半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①这说明，一个时代的哲学除了受到经济、政治、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作用外，还直接受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不同的时代主要由于其经济、政治原因，还会在各种思想汇合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潮流，即所谓时代思潮。这种时代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潮对该时代哲学家的影响尤为值得注意。例如，我们研究玄学家的思想，就不可不注意魏晋时期整个玄学思潮的影响；我们研究道学家的哲学，亦不可不注意整个宋明道学思潮的影响；我们研究明清之际哲学家们的思想，也不可不注意当时萌兴的启蒙思潮的影响。我们在考察各种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对哲学的影响时，都要看到这种影响往往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具体考察这些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思潮影响哲学发展的条件、途径，还要正确评价它们对哲学发生影响的大小，既不能忽视，也不要估计过高。这对揭示哲学思想产生、发展的规律也是很必要的。

关于个性环境的考察。历史上的哲学家，哪怕是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理论虽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往往各有特色，甚至个性鲜明。这种特色或个性是由各思想家独特的或富有个性色彩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因此，当我们横向考察一定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社会环境的联系时，我们还要注意考察那些造成哲学家思想的个性特色的、独特的或富有个性色彩的生活环境，即所谓个性环境的考察。个性环境的考察可分为多阶层次。例如，要探索造成不同时代哲学家思想的个性特色的原因，首先就要考察不同时代的特点；而要探索同一时期不同哲学家思想的个性特色，首先便要考察地区性的差异，特别要注意不同地区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如先秦有所谓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的不同①，后来的禅宗有南方、北方的差别，宋代的濂、洛、关、闽、永嘉、永康诸学派亦与地区差异相关；最后，要探索造成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不同哲学家思想的个性特色的原因，就要考察其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的特殊经历，如家庭教育、师承关系以及其他生活经历的特殊性，等等。总之，我们要考察不同时代的特点、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及哲学家个人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的特殊性等等是如何影响哲

①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25 页。

学家的思想，造成其思想理论的个性特色的。通过这种考察，揭示各种哲学思想或哲学理论体系的个性特色所由造成的原因，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哲学史上各具特色的哲学体系，揭示造成哲学史丰富多样性的根源以及哲学产生、发展的规律都是有意义的。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谈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对该时代哲学形成、发展的影响或决定作用。但是，一定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社会环境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即哲学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或反作用。因此，当我们横向考察哲学史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时，还应考察一定时代的哲学对该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或反作用。哲学远离社会经济基础。哲学通过给统治阶级提供世界观而影响其政治、法律思想，或为其统治方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进而通过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现实化或统治方略的实施而影响社会存在。哲学还通过渗进社会心理、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而发生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或反作用。如汉初黄老哲学的自然无为思想，作为统治阶级采取与民休息方针的指导原则，在当时符合战乱后人民企望安居乐业的社会心理，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又如，董仲舒的哲学为汉初统治者营造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理论依据，对于维护和巩固新确立的封建大一统局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亦起了进步作用。当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他的理论所起的社会作用逐渐走向了反面，从而清楚地暴露了其理论固有的局限性。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考察一种哲学对其社会环境的影响或反作用，可以看出其哲学的社会作用是否进步，有利于对其历史地位、社会影响作出准确的、科学的评判。

第三，在哲学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的“相关性——结构性”原则，除了如上所述从宏观上纵向、横向考察历史上各个哲学体系之间以及各哲学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之外，还更应从微观上把各个哲学家自身的哲学思想如实地看作是由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成的具有内部结构的系统来加以研究。由于哲学史总是通过一个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来的，因而可以说每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